

# 章太炎：典籍分类、文类与现代文学

陕 庆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类学的角度探讨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文学”定义的思想史内涵。章太炎的“文学”概念由“文”的范围和“文”的法式两个部分组成。在讨论“文”的范围时，是以反分类的方式展开的，“文”实际上是“六经皆史”的一个环节。在讨论“文”的法式时，章太炎认为真正的文类源于古代政教的功能。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呈现了中国传统世界与现代性规划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对“现代文学”的一种话语权的争夺。

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学科划分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学问宜分科也”，“不立专门，终无心得”<sup>①</sup>。而对于分科的作用，陈黻宸曾这样说道：

“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未详。我国固非无学也，然耐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其穷理也，不问其始于何点，终于何极。其论事也，不问其所致何端，所推何委。”<sup>②</sup>

陈黻宸所说的学科的优越性在于“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未详”，即学理和记事有清晰的来龙去脉，而中国学术因为没有学科而导致了“迁流失实”的现状。中国现代学术分科这一转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20世纪初基本实现，直到20年代末才最后完成。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实际上正如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所建议的“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经过政府派员赴日考察，日本大学的六科（文、法、理、工、农、医）划分成为京师大学堂重要的参照。承续此前展开的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关于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同样渗透着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国现代学科建制的过程实际上既包含对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的移植，也包含中国传统学

术系统的重构和转化<sup>③</sup>。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科目设置以实用为导向，主要借用了日本的六科之学，而1903年由张之洞主持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经学科”，体现了“中学为体”的导向。在这两个章程中，可以看到“文学”一科内容的变化。在《钦定章程》中，“文学”主要是词章之学。这种认识是梁启超1898年《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定下的基调，正如陈国球所说，“在梁启超看来，‘文’就在‘致用’的大方向下，成为‘学’的辅佐工具，但‘文’却不是‘学’，更无独立的价值”<sup>④</sup>。而在《奏定章程》中则“文学”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和地理<sup>⑤</sup>。在张之洞的设置中，“文学科”包含了“中学”的重要内容。如果对应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划分，张之洞用经学科统揽子学和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学），而“文学科”则包含史学和经学，将“掌故学”、“词章学”归入“文学科”，这也纠正了一种将传统学术工具化、零碎化的趋势。

中国传统的四部虽然不是与近代西方相对应的一种学科划分方式，但当中国的学术系统面临西方的学术分科的挑战时，四部实际上被作为一种对自身学术系统的认识和描述，并产生出学科分类的意义，比如，经部和子部对应于哲学，史部对应于历史学，集部则对应为文学。众所周知，四部首先是典籍编目、分类法，晚清引进了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后，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代替了四

部。图书分类法的改变只是新的分科之学确立的一个步骤，具有直接决定性的是近代学科建制的确立。

以清末新政开始的中国现代学科建制的过程中，传统的书籍、知识分类法——七略、四部，甚至儒家的四科之学等都不同程度地被作为一种资源和参照，可见分类对于学术的重要性。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开篇便从分类讲起，追问一种分类得以确立的基础是什么。而对于这种分类依据的性质的认识，福柯说：“人们不久就会明白，它既不是由一种先天必然的连贯所决定的，也不是由直接可感知的内容强加于我们的。因为这不是把结果联系起来的问题，而是对具体内容作集合和隔离、分析、调整和榫合的问题；没有比在物中确立一个秩序的过程更具探索性、更具经验性（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更需要一双锋利的眼睛或一种较为确信的抑扬顿挫的语言，更坚决地要求一个人要允许自己被性质和形式的激增所摆布。”<sup>⑥</sup>只是相比福柯所讨论的西方学科划分，七略、四部作为分类法所直接面对的是书籍，而不是事物或知识，但相同的是，分类的依据在本质上不是先天必然的，而是经验性的、人为的，在这个过程中人必须发挥自己的判断和表达，并且也必然面临着由于“性质和形式的激增”——或者如中国古人所认识到的，事物之间特性的共享、交叠、错杂——而带来的困扰。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现代学科划分的一个门类，而在现代文学确立之前，“文学”一词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指称学术？实际上产生出了差别颇大的分歧。梁启超仅仅采用了文学等于词章的狭窄涵义，实际上不仅是陈国球所认为的这是将现代意义的文学边缘化了，更是放弃了“文学”一词在传统的脉络中所可能具有的最广泛、最深远的意义。张之洞的“文学科”的范围显然比梁启超宽泛，但“经学科”仍然是“中学”的钢骨。而在几年之后的章太炎那里，“文学”却被表述为一种涵盖一切书写的范畴。章太炎没有参与官方的学科建设，而是将这个表述编织进自己的学术史著作《国故论衡》中，并成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毋宁说，章太炎的“文学”概念是以一种反分类的方式展开的，而他在讨论“文学”

内部诸问题时，分类法始终是分析的对象，既包括西方学科分类也包括中国传统的分类法“四部”和“七略”。

## 一 章太炎的“文学”定义

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学科得以制度性的确立，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是发生在晚清至民初。其确立的标志是：“文学”作为学科在大学中被设立；出现了奠定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基调的理论表述；出现了具有现代文学起源意义的作品。这个时期主流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认为是五四时期。但这一持续的过程要上溯到晚清，其实践的内容包括语言、文字的改革，各类文类的倡导等等。现代文学的确立是整个现代创制的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从传统的“文”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转变，正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型的转变，表现为政教系统的瓦解，“文”丧失了作为礼乐的呈现方式的意义性基础。

在应对西学东渐，尤其是以西学格局在官方层面来规划学术体系已经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以《国粹学报》群体为主导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倡导国学。他们在讨论“国学”时，“文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为国学的一个分支、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分享了现代文学和现代国家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1906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获罪刑满，开始在《国粹学报》发表讨论语言、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入《国故论衡》，于1910年在东京出版。这些讨论都是在《国粹学报》展开过一些讨论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尤其以刘师培为主。刘师培从本质探究、时代流变、文类关系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议题，比如“自古文章导源于小学”，“骈文为文章正宗”等，在讨论过程中明显突出了文字、语音、文章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囿于传统“文章”的范畴，恰恰与现代学科中的文学相对应——同样是作为一个系统中的一支。有意思的是，后来胡适对章太炎“复古”的批判同样是从“文章”的角度，称“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sup>⑦</sup>。但此处正要

章太炎自己对“文章”的追求以及旁人从“文章”角度对他的认识,与他对“文学”论述所包含的知识背景、时代性意图区分开来。章太炎关于“文学”论述最显著的特点,正如姜义华所说:“章太炎鼓吹‘文学复古’时所说的‘文学’,更多的则正是指这一广义概念的范围。”<sup>⑧</sup>收入《国故论衡》的《文学总略》之“略”,即是范围、疆界的意思。这篇文章于1906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编入《国故论衡》时略有增删,源于章氏本年在东京国学讲习会所作的题为《论文学》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章太炎已经提出了“何以谓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sup>⑨</sup>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将文学范畴推至广泛的说法。实际上,“文学”一词的内涵不仅在当时尚未被固化,在章太炎那里也经历了变迁。章太炎第一次以“文学”这个词为论题,是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学说例》一文。但这篇论文的“文学”的含义主要是文字之学,章太炎引用了日本学者姊崎正治的《宗教病理学》中关于言语与外物因为本来就不能吻合而导致的人类思想必然会有表象主义病质,来说明中国传统中关于“文言”与“质言”的问题。他说:“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而对于如何由文返质的方式,则是通过:一要“断雕为朴”,二要勇于“解剖”。并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的词性、句法特征进行了分析。可以说,1902年的章太炎所论的“文学”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所展开的讨论也并非直接针对现代文学确立的主要问题。这显然与1906年章太炎在《论文学》中旗帜鲜明地为文学确定范围的讨论大为不同。实际上,从《论文学》的演讲到《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学论略》再到《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可以看到章太炎对于“文学”的涵盖范围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系统化。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国故论衡》这部著作的系统性,及其背后对于重造国学系统的追求和方法论意识。《论文学》虽然提出了对于文学疆界的表述,但对于划定这一疆界的意义还并没有明晰,因此也未将之作为纲领来论述。《文学论略》与《文学总略》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单篇论述,后者则是作为讨论整个“文学”系统的

纲领。而《论文学》和《文学论略》、《文学总略》最大的区别则在于,他花了很大篇幅讨论“有句读文”中的各体文<sup>⑩</sup>,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典论·论文》与《文心雕龙》对于各体文特征(或者说理想状态的要求)的论述。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对“文学”的表述包括“范围”和“法式”两个方面。“法式”的重要内容便是曹丕、刘勰奠定的文体论述,章氏将之与“范围”结合起来;而对“文”“质”问题的讨论,也由语言的层面转换到典籍问题上来,将它包含在“范围”这一问题之下。章太炎《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以及整个中篇对“文学”的论述无疑是对之前思想的整理,以学术史的资源和方法展开对新问题的“文学”一次系统的讨论。

章太炎不满于从分科的角度讨论文学,无论是传统的四部分类还是现代的学术分科。他将文学解释为涵盖性的范畴,对于时论所作的关于文章与彰彰、文与笔、文章与学术的区分,予以一一批驳。虽然相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章太炎所确定的一切“著之竹帛”者已经是非常泛化,但相对于古典意义上的“文章”,这里的“文”又是一个已经缩小了的概念,因为古代的文章指礼乐:“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礼;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sup>⑪</sup>一方面,章太炎强调“古之文章”是礼乐的别称,指出改“文章”为“彰彰”是错误做法,因为文章绝不等于修辞,而是具有礼乐内涵;而另一方面,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明确强调书面记载,这意味着对未被书面记载的礼乐制度的“文章”存而不论,只考察“移于篇什”之后的礼乐。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讨论清代经史之学与制度探求时,重点讨论了顾炎武的考证之学与探求礼乐制度的关系,他称这种研究的指向是为了建立“新礼乐论”。而顾炎武的经学考证所遍及的礼乐、制度、典章、风俗、传统、人物、语言、自然等各个方面,所对应的就是顾氏所说的“博学于文”的“文”。汪晖认为,顾氏的著作中,“礼”与“文”具有互文关系,“‘文’不是指文字,不是指文章,而是一种内在规则、

一种合乎礼仪的行动中自然呈现出的条理”<sup>⑩</sup>。暂且不论顾氏所论“文”的内在规则这一方面，顾炎武所批判的宋明理学的弊病包括束书不观、空谈心性，也包括文辞与学说的分离，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专攻文辞的文人之文的存在。顾炎武通往礼乐的道路首先便是批判那些遗忘、远离礼乐的文人之文，因此，恢复“文”的涵盖一切与制度创制有关的秩序的内涵，成了第一要务。这正是章太炎将“文”推至涵盖一切书面记载的思想的渊源，也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最重要甚至最终的任务。与顾炎武广泛考辨一切与制度有关的事物不同，章太炎将范围设置在书面记载中。章太炎的竭力捍卫书面记载，即古代典籍的背景是渊源已久的今文经学和新近风尚的实证史学相交织的疑古疑经思潮。因此，这并不是否认书面记载之外的内容，而是书面记载既是疑古思潮首当其冲的对象，也是战胜疑古思潮的唯一依据。因此，对于章太炎来说，书面记载的“文”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虽然章太炎的文学概念提出的情境正处于现代文学形成时期，深受来自一种日渐形成的现代文学的压力，但如果将之仅仅放在现代文学的对立面来理解，它的意义也将被其对立面局限，对历史的理解也将变得局促、简单。章太炎是晚清重提章学诚“六经皆史”主张最力的一位，对之后胡适、傅斯年展开的“整理国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谈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sup>⑪</sup>并从道器一体的角度指出“六经皆器也”<sup>⑫</sup>。在《校雠通义》中，章学诚又从文字、文献渊源的角度强调：“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sup>⑬</sup>这便是章学诚“六经皆史”所包含的几个方面内涵，各有所指，各有侧重。章太炎虽主张“六经皆史”，却没有重复章学诚的方式讨论“道”与“器”、“事”与“理”这种抽象与具体、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和形态，而是侧重于章学诚在《校雠通义》里的方式，从文字、文献的角度阐述“六经皆史”的主张。因此，章太炎所着力讨论的“文”比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要窄，专注于“竹帛”，而这个“文”也就是“六经”的具体形态，“文”本身作为物质性的遗留物，就是“史”。但这并不意味着

章太炎不关心礼乐的抽象形态，毋宁说，他悬置了抽象形态的礼乐，也放弃了从抽象的方式来探讨礼乐制度。实际上，章太炎所说的“文”在他的思想结构中的作用是用来替换章学诚所说的“史”，进而将“史”功能化、动态化，以此将“史”既与经史二分的经和狭义的史区分开来，更与实证史学划清界限，并且借助于对“文”的论述，也进一步指出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不彻底之处，呈现自己将新的时代问题纳入思考和论述的能动性。

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以“文”来统领篇章，打破了经、史、子、集以至任何一种分类，所论各篇章只是作为举例：“有句读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为五篇，非曰能尽，盖以备常文之品而已。”<sup>⑭</sup>他所讨论的以下各篇分别是：《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和《正赅送》。“六籍，文也，非徒诵习之，必也行乎。礼义，行也，非色取之，必也忠信乎。”<sup>⑮</sup>“文”不仅是典籍的总称，更包含了典籍的原理性内涵（或者说本质），实际上指向了“史”的意涵，其“法式”也包含在这几篇论述之中。章太炎以“文”笼盖所有文字记载，以“法式”之学确立这些典籍记载的源流，一方面否定了将典籍编目直接作为学科、知识分类学，另一方面又重新阐释了典籍分类以及由此衍生的文类（文体）的历史内涵，也就是他所说的“文之法式”。因此，章太炎拒绝以分科的方式讨论“文学”，同时又特别强调固有的分类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既勘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典籍，也指明了对于典籍理解的可能和途径：这些本身藏在典籍的内部，是典籍形成的机制，而对于机制的掌握是达到理解的唯一途径。

## 二 “文”作为“六经皆史”的环节

中国传统的典籍编目和分类，影响最大的，先有七略，后有四部。古籍中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已渺然不可考。《七略》始于汉代刘向，完成于刘歆，保存于《汉书·艺文志》。18世纪的清代学术以训诂明经为主流，尤其是戴震训诂考证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对于宋明学术疏于考据、空谈心性的风气起到了有效的纠偏作用。

戴震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训诂明经的成功,也使得他最终得到了朝廷的破例重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而此时的章学诚,身为晚学,地位卑微,平生熟读史籍,明晓典籍源流,在高度肯定戴震“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之所以然,将以明道也”<sup>⑧</sup>之余,指出“戴君经术淹贯……而不解史学也”<sup>⑨</sup>。章学诚将自己治学的方法称之为“文史校讎”,实与戴震的训诂明经的方法相对且互补。校讎的原意是版本校勘,语出刘向<sup>⑩</sup>。从章学诚的《校讎通义》可见他的校讎学不仅是指版本校勘,而主要是指典籍的源流、编目系统、编辑方法、著述体例等。因此,“但举‘校讎’,足以包括无余。所谓‘版本’、‘校勘’、‘目录’,都不过是‘校讎学’的几个组成部分”<sup>⑪</sup>。这便是他最终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方法。“文史校讎”是章学诚论证“六经皆史”,将“史”最终作为一个比“经”更为原初的范畴的核心方法<sup>⑫</sup>。

“文史校讎”方法得以展开分析的主轴便是“七略”与“四部”及其变迁。章学诚认为从“七略”到“四部”的变化如同“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不容已者也”,“四部”不可能返回到“七略”。追溯“七略”源流的目的是“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sup>⑬</sup>。“七略”与“四部”本质的差别就在于“七略”保留了典籍的源流,以及古代“官师合一”的学术制度,而“四部”则掩盖了这些信息<sup>⑭</sup>。除了“七略”与“四部”在分类方面的差别,刘向、刘歆的典籍编纂保留了书籍更多的信息,这就是叙录和小序。叙录记载了作者的时代、学术等信息。小序是将书籍分为六类之后,叙各家源流利弊的内容,总合起来编为《辑略》。刘向、刘歆的典籍编纂工作包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两项内容。因此,班固曰:“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又曰:“爰著目录,略序洪烈。”<sup>⑮</sup>章学诚在此基础上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晚清成了一脉学术的基本出发点。《国粹学报》发刊词云:“自汉氏后二千余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纵其间,递兴递衰,莫不有一时好尚以成其所学之盛。然学术流别,茫乎未闻。惟近儒章氏、龚氏崛起浙西,由

汉志之微言,上窥官守师儒之成法,较之郑(樵)、焦(竑),盖有进矣。”<sup>⑯</sup>章太炎自青年时代区分今古文经学开始便号称学术宗刘氏,自称“刘子骏绍述者”。1906年,在“国学讲习会”“论诸子学”一讲中,他对国学存在的问题所下的判断是:“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后面又说:“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sup>⑰</sup>章太炎此处所说“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孔子的功绩在“述”而不在“作”,并将之与司马迁、班固和刘歆的工作相埒,与章学诚一脉相承。

然而,章太炎在进一步阐发“文之法式”的过程中却展开了对章学诚的批驳。与章学诚相同,他延续了“七略”未分经史的看法,从历史形成和制度的角度将“史”阐述为比“经”更原初同时也更具原理性的范畴。然而,章太炎却指出章学诚在官私的严格分界上造成了矛盾。

实际上,章学诚关于著史的很多丰富的思想体现在对于方志和个人书写的讨论中。但是,章太炎并不认为章学诚因此便完善了关于著史问题的整个思考,而是以一种讥讽的态度称之只是出于修方志谋生才一反“史者固不可私作”的看法<sup>⑱</sup>。即使是正史,章学诚也将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著史区分为“记注”与“撰述”所处情形的区别<sup>⑲</sup>。可见章学诚对时势变迁与著述变化之间的关系深为体察。然而章太炎为何对章学诚所说的官私之分如此激愤?有学者认为目的是影射张之洞的《劝学篇》<sup>⑳</sup>,这部书曾一度被清廷高度重视,刻印派发给官员阅读。不管章太炎批驳章学诚是否来源于现实中张之洞期待官师合一的压力,实际上,从章太炎的文本来看,他对章学诚公私严分的批判开启了一个新的对于“史”的论述方向。

章太炎认为章学诚虽然将“经”安放在更为原初的“史”的范畴,但他严分官私,同时官私随着时间而演变,这实际上正是后世经史区隔的依据。即古史为经,后来的著述为史:“且言左氏

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并注曰：“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皆同此说。”<sup>⑧</sup>对于章太炎来说，古今由于官私的差别，必然包含着价值的悬殊，这恰恰给将古史神秘化开了方便之门。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不彻底的地方。因此，章太炎的方法是将古史放置在多样的生成的状态中，而不是同质化、凝固化，比方说，《易》只是与《连山》、《归藏》合称“三易”中之一种；又引孟子语“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来说明《春秋》只是古史之一种。另外，也是最能体现章太炎彻底之处的是，他追溯书籍名称的来历，呈现这些名称最初纯粹的物质性的描述：“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sup>⑨</sup>他说“传”本是“六寸簿”，得名的原因是所书写的简册比经短，又引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而“论”的意思则是“比竹成册，各就次第”<sup>⑩</sup>。而章太炎认为这种名称来源的物质性基础正是文字相比于语言的优越性：“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sup>⑪</sup>。在此，章太炎将文字记载所具有的物质性基础——而这种物质性基础正是章太炎所强调的“历史”的属性——进一步推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角度，这已是最彻底的理论姿态了。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章太炎与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的主张不谋而合，都强调书写的独立性甚至本原性，同样是对先验的破除（德里达的逻各斯，章太炎的“经”），章太炎的论述所侧重的则是“史”、“文”在这一问题中的环节性意义。

综上所述，章太炎所说的“著之竹帛”，不仅包括现有的书面遗留物，还包括曾经付诸于书面的一切内容；不仅打破了经史分类，而且铲除了“史”被“经”化的基础。章太炎虽然强调“典章制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在此处，他将“制度”本身置于历史化的空间，尤其拒绝用单一的视角来描述制度。

### 三 四部划分与具有源流意义的文类

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学作为学术分科中的一类，不仅移植了西方的结构，也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划分进行了转化。刘师培便认为“文”是区别于经、史、子的一个类别：“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sup>⑫</sup>

在章太炎看来，如果讨论文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来源，则必须放在“四部”及其历史形成中去讨论。章太炎认为，经、史、子、集的划分并不能说明问题，它只是我们对于所有典籍的一个笼统的分类，四者并举对于所有典籍的包揽性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分类的意义，尤其是这四者本身并不具有“文类”的意义，集部也不是一个具有内涵的概念。章太炎在1913年的一个演说中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唐代收书，乃于经、史、子之外，别立集名。夫集部，本不能独立，以其不经不史不子，而姑立集名，以网之耳。集部中，如箴、铭、诔、赞，固难以子、史相绳，然论辩之文，有时似经，有时类子，传、状、碑志，则纯为史矣。又如汪容甫《述学》一书类子，其中又多论经之语，盖其名称难于论定也如此。大抵后人以书为三代以上人所著，则谓之经；为周秦人所著，则谓之子；至若两汉以后著录之书，其文成条贯者，则谓之史；其篇章零杂者，则谓之集。经部之中，不乏类史之书，如《尚书》、《春秋》则类史。子部之文，岂无名经之作，如《老子》、《庄子》、《离骚》，皆名经之类。此中封域，原不可截然分也。章实斋谓：宋人笔记及近人考订诸书，可入集部，其说甚是。近人书由本人撰者为子，由后人编辑者为集，其说亦不尽然。如《管子》及《晏子春秋》，皆为后人所纂，何以不名为集？盖子、集之名，亦无一定标准。凡论文之术，范围必广，无论集部之文宜论之，即经、史、诸子，亦无不宜论，如《文心雕龙》是也。凡选文之书，范围必狭。选文之书，古谓之总集。总集者，虑文章之溃散，故粹其精者，归于一编，经典成文之不虞溃散者，则不入选。如《文选》

即遵此例而作也。如《周官》中《考工记》，选文者可以不选，而论文章体例则不能遗之。”<sup>⑧</sup>

这段论述是说，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集”具有不同的涵义，比如唐代集部的来历是为了便于保存那些不能归于经、史、子的文章。而即使就经、史、子这三部而言，也非绝对，它们之间亦有交叉。经、史、子、集作为典籍分类方式在《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集”这一名称的来源是挚虞的《文章流别》，《文选》就是以此为依据，李充的《翰林论》，刘义庆的《集林》，沈约、丘迟的《集钞》都是受此影响。“《七略》惟有诗赋，及东汉铭诔论辩始繁，荀勖以四部变古，李充、谢灵运继之，则集部自此著。”<sup>⑨</sup>章太炎认为四部的划分和集部的出现，一方面是“文类日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出于人为的偶然性。而《文选》实际上就是这类“集”：“《文选》上承其流，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钞》，然已瘳矣。”瘳，音消。庞俊、郭诚永的疏证引徐广的《史记集解》：“瘳犹衰微。”<sup>⑩</sup>据《王力古汉语字典》，瘳，释为病名，具体指头痛和消渴<sup>⑪</sup>。这两种“瘳”的释义都可以通达此处的文义。章太炎认为，《文选》没有延续“集”的名称，又加上萧统的序，人为地割裂了“集”的来历，造成了对“集”的本意的遗忘，这实际上是发生了一次名实讹误。章太炎梳理了这一线索，并进而否认萧统的《文选序》具有分类依据，认为《文选序》只是“率尔之言，不为恒则”<sup>⑫</sup>。这种对于经、史、子、集分类的认识，尤其是集部的本义的认识，在章学诚那里也可看到同样的立场。上文提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四部”追溯“七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七略”未做“经”、“史”之分。“七略”与“四部”另一个在分类上重大的区别是，“七略”没有“集”这一意义含糊的一类，只有“诗赋”。章学诚曾在《修志十议》以及他在给正在编地方志的甄松年的信中提了一些建议，这是他关于文章、典籍分类的思想的首次系统表达。其中关于“艺文”部分由于不属于“史”的范畴，对它们的归类，章学诚建议：“艺文”部分应该是一个关于地方著述的评点性目录，就像“三通”和“七略”那样；直接关

涉到地方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文字应该以征引的方式归入相应内容，关乎个人的一些重要文字可收入传记；其他有价值却无法归类的文字应该收入一部文集中，作为地方志的附录，这就是“文选”，正是以萧统的“文选”为范型。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集》中较为详尽地记述了集部产生的过程：

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记述、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sup>⑬</sup>

在章学诚的描述中，荀勖的《中经》和王俭的《七志》中，诗赋所归入的一类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比较混杂，也尚未有“集”这个分类的名称。到了阮孝绪撰《七录》，已经是唐代人经、史、子、集的格局，“文集”已经单列为一个分类的名称。实际上，章学诚认为，“集”的名称来自萧统的《文选》，并指出这是古代学术源流的一大变革。

接下来章学诚感慨这一时势实为“道术为天下裂”，但学者对此却鲜有深知：“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sup>⑭</sup>但章学诚最终关心的是名实的混淆，即集部本身的混杂：“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闇，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sup>⑮</sup>因为名实混淆而导致学术源流暗昧不明，这也是章太炎一直关心的问题，但章太炎讨论集部源流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目的——在根本上否认集部作为内涵性的范畴，成为现代文学在中国传统中的类似物和源头。

因此，典籍分类的沿革所造成的名实混淆是导致中国学术“汗漫”的重要原因。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集部不仅不是一个体现典籍源流的分类，而且集部本身内部的混杂，还使得各“文类”造成混乱。在章太炎看来，各



“文类”都渊源有自，保留了源流的信息，他所提到的箴、铭、诔、赞即为这个意义上的“文类”。

中国传统关于文类的论述十分丰富<sup>④</sup>，并且“文类”一词的涵义也一直莫衷一是，大致包含分类和风格这两层内涵。有时偏重分类，即体裁；有时偏重风格，即体貌；有时又体现了这两者之间相互决定的一种关系<sup>⑤</sup>。章太炎在强调《文选》不能涵盖所有的文类，比如《考工记》时，首先是在一个类别的意义上说的。与拒绝诸如传统的四部或现代学科的分类不同，章太炎显然承认传统的“文类”作为类别的意义。章太炎在1906年的演讲《论文学》中是这样划分文类类别的：首先将文分作“有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两大类。“无句读文”包括图画、表谱、簿录、算草四种；“有句读文”又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六种；“无韵文”包括学说（诸子、疏证、平议）、历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国别史、地志、姓氏书等）、公牍（诏诰、奏议、文移、批判、告示、契约等）、典章（书志、官礼、律例、公法、仪注）、杂文（符命、论说、对策、杂记、述序、书札）、小说<sup>⑥</sup>。章太炎这个分类中最细的内容仍有很多来自曹丕、刘勰所论的文类，只是名称稍有变异。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其中所提文类有四：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文心雕龙》从《明诗》至《书记》这二十篇被认为是分别讨论了二十种文类，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和书记。对比曹丕和刘勰的分类，章太炎按照功能的差别对文类进行了分类，其中历史、典章、小说这三类是曹丕和刘勰所未包括的。

对章太炎来说，这些传统文类的名称的意义在于具有源流的信息，这一点与刘勰“原始以表末”的说法相同。刘勰将魏晋时期“文类日滋”时代的众多文类与六经的关系表述得甚为清晰：“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

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起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sup>⑦</sup>章太炎论文章源流仍延续刘勰，后世文类来自“官文”，而文章的风格也继承了起初的“官文”：“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sup>⑧</sup>各种文类出现的前提是“官文”自身的系统的崩溃，它们是从这个崩溃的系统中流散出来的形式：“经术已不行于王路，丧祭尚在，冠昏朝觐，犹弗能替旧常，故议礼之文亦独至。”<sup>⑨</sup>并且由于诸子源于王官，各文类又与诸子有继承关系：“大氏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其当官奋笔一也，而风流所自有殊。”<sup>⑩</sup>

章太炎虽然从“史”的角度否定了官私严分，但并不等于他无视“官文”的存在和意义。章太炎的“文学”定义的两个层次：对于文的范围的表述和对于“法式”的强调缺一不可。章太炎认为文章的体式是由政教制度决定的，何处有定式，何处无定式，从文章源流可以判断：

古人文字，有一定之式，有无定之式。有一定之式者不变，如《周官》为后世官制之祖，《汉律》为后世法律之祖，《九章》为后世算数之祖，虽今日官制、法律、算数若何繁衍，然皆自此数书推衍以出，其文其式，未尝变也。有无定之式者常变，如单篇文字，汉异于周秦，唐以后又异于两汉，其变动之迹，常若可寻。惟宋苏氏兄弟对策之文，起首及结束，皆有定式，又单篇文字之例外者也。桐城论文，乃欲于无定式者，规规然使其有定式，不免为多事矣。<sup>⑪</sup>

章太炎在这里从有无定式的角度对古人文字进行了区分。如官制、法律、算数这类文字由于源自《周官》、《汉律》、《九章》，其体式并没有改变，而单篇文章则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章太炎此处所提到的“单篇文章”可以说是狭义的文章，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范畴，这里特地提到桐城文的定式无效，原因在于桐城文与古代政典没有联系，自己硬规定定式则是多此一举。在章太炎看来，区分有定式之文和无定式之文非常必要，一方面防止无定式之文造出的定式混淆了原有定式，另一方面也旨在表明无定式之文不



断变化的特征。

因此,章太炎所承认的“文类”是来源于古代政教的功能,完全不同于现代文学内部的诸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建立和划分。而他对于“文学”的划分也是出于他对当时以及不久的将来世界的功能性的理解所作出的,这与现代性规划中将文学作为一个分类的设置截然不同。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本身所发挥的文化政治的功能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作为分类的设置,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诸如周氏兄弟的文学革命之间存在深层的联系,如木山英雄所作的分析<sup>⑧</sup>;而为了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空间和加深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章太炎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来挖掘,如陈雪虎的研究<sup>⑨</sup>。需要强调的是,章太炎对四部和现代分类的拒绝这一点堪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相类比,但章太炎并非无条件地抽空一切分类,恰恰相反,他所做的考古是为了澄清可信的分类,这是章太炎思想一个重要的面相,与他借用佛学、庄子所阐述的“无”的思想须分而视之。从分类的角度重新探讨章太炎“文学”定义的思想史渊源和时代意义,是为了便于揭示章太炎所阐述的中国传统生活世界的象征体系与现代性规划的巨大差异,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差异,或者说历史的断裂,才能够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转变,以及有可能使传统具有当下性。而另一方面,章太炎在传统的学术脉络中为新出现的“文学”下定义,显然是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差异,并努力争夺话语权的行动。因此,虽然章太炎所讨论的“文学”确切地说是学术史,却不应该直接作为学术史来对待。

①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22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②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黻宸集》下册,第675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④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钦定章程》将“初等小学堂”的语文课称作“中国文字”,从“高等小学堂”开始,到“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备科)改成“中国文学”。“大学堂”中

“文学科大学”共有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大致可分为中外史学、中外文学和地理学三种。与《钦定章程》相较,原先“经学”、“理学”二门同归“经学科”,“诸子学”变成“理学门”下一科,“掌故学”不复存在,“词章学”改题“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则分排成英、法、俄、德、日五国的“文学门”。由于“经学科”的独立,吸纳了有关思想一类的学科,于是“文学科大学”的重点便落在历史和语言文学的范围之内,只是令附上“地理学”一门。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0页—第34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⑥[法]福柯:《词与物》,第7页,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⑦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全集》,第3卷,第30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⑧⑨⑩⑪⑫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51页,转引自第352页,见第355页,第3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⑬⑭⑮⑯⑰⑱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第49页,第56页,第53—54,54,54页,第59页,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⑲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理与物》,第350—3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⑳[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1页,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㉑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文史通义校注》,第132页。

㉒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文史通义校注》,第951页。

㉓章太炎:《蕅汉昌言》,《蕅汉三言》,第107页,虞云国校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㉔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章学诚遗书》,第1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㉕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章学诚遗书》,第128页。

㉖刘向对校雠的描述是:“一人读书,校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见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第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㉗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102—10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㉘汪晖:“章学诚把道器一体、治道合一、理礼合一等命题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史的范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461页。

- ②③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第二》，《文史通义校注》，第956页。
- ②④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诗赋略（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术数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汉书·艺文志》将之划入各部类的小序，所以实际登录的门类只有六略。
- ②⑤[汉]班固：《汉书·叙传下》，第424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②⑥《国粹学报·发刊词》，1905年正月号。
- ②⑦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17—21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②⑧③①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第60页，第61页。
- ②⑨“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30页。
- ③⑩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 ③⑪《国粹学报》，第1期，第4页。
- ③⑫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第141—142页，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 ③⑬⑭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第272，272页，庞俊、郭诚永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
- ③⑮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第756页，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
- ④①④②③[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文史通义校注》，第297，297，298页，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④④具有代表性的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晋挚虞《文章流别》，梁任昉《文章缘起》，至刘勰《文心雕龙》最为详备；此后，自萧统《文选》到《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再到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
- ④⑤罗宗强：《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第1—22页，吴承学、何诗海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
- ④⑦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文心雕龙义证》，第78—79页，詹瑛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④⑧④⑨⑤⑩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第85，82，86页。
- ⑤①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第142页，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 ⑤②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⑤③陈雪虎：《“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范智红

